

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结构分析:2006—2015

范雷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以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升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已成为基本共识。而在中等收入群体的巩固和扩大过程中,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就业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提供了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目前,中国居民人均收入中,与就业相关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仍占有很高比例。另一方面,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等因素也通过就业结构塑造着该时期、该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构成和主要特征。因此,从就业结构视角分析中等收入群体构成,将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一群体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

所谓就业结构,指不同就业人口之间及其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关系,它表明了劳动力资源配置状况或变化特征。由于就业结构与个人收入而非家庭人均收入直接相关,因此本文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06—2015年数据为基础,以受访者个人收入相对指标作为划分标准,从就业结构角度对中国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状况加以描述和分析。采用相对标准,主要是从收入结构的意义上理解中等收入群体^[1],以便更好分析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

一、中国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 随经济结构转型初步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近年来,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完善经济结构、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保障就业、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从就业的产业结构看,据统计,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70.5:17.3:12.2发展到2015年末的28.4:29.0:42.4,实现了就业结构由传统农业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而在就业的职业结构方面,从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和CSS历年调查数据可以发现,自1990年以来,中国职业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在就业结构中的比例不断下降,由1990年的70.69%降至2015年的34.4%;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

员、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等群体的比例有所上升;而商业服务业人员群体增加的比例最大,由1990年的5.41%增至2015年的21.9%(参见下表1)。表明现阶段中国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初步形成,并正逐渐趋向合理。

相对于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依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陆学艺以“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来形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他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真正发生历史性变化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并经历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初步形成,但相对于经济结构,当前的社会结构大约滞后15年^[2]。就目前而言,这种社会阶层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的状况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首先,目前中国农村人口仍占据大多数,因此,农村人口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提高对于中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对应于第一产业的产值,第一产业就业人员规模依然过大,其劳动生产率依然较低。加之,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三、四线城市发展迟滞,农民工外出务工人数增速下降而回流规模增加,将有可能导致农村隐性失业问题的显性化,造成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放缓,进而影响中国就业的职业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使社会阶层结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减速。其次,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就业的产业结构演变来看,普遍存在随着经济水平提高,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发展路径。但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业的产业结构发展看,这一就业的产业结构转型特征并不明显,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的过程尚未完全展开,便出现第一产业劳动力迅速转向第三产业,甚至可以说两者是同步进行的。从CSS调查数据可以看出,生产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中农民工所占比例,2006年分别为57.7%和45.2%,2008年分别为66.2%和48.1%,2011年分别为74.5%和62.9%,2013年分别为82.9%和70.8%,2015年分别为81.4%和68.3%。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第二产业的充分发展,加速了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终结。且就长期而言,不利于农村人口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持续提高,以及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表1 1990—2015年中国职业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 (%)

	1990年	2000年	2005年	2006年	2008年	2011年	2013年	2015年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1.75	1.69	0.50*	2.4	2.7	4.2	3.1	3.4
专业技术人员	5.32	5.67	7.60	6.0	3.6	8.8	6.8	8.5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1.74	3.08	3.68	5.7	6.4	8.6	7.7	8.7
商业工作人员	5.41	9.22	12.17	10.6	10.7	12.3	11.7	12.1
服务性工作人员				7.1	8.0	9.0	9.1	9.8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70.69	64.38	56.95	50.2	49.5	37.1	35.6	34.4
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	15.03	15.89	17.85	17.2	18.8	18.9	25.4	22.2
警察及军人	—	—	—	0.4	0.2	0.5	0.3	0.2
不便分类人员	0.05	0.07	0.23	0.3	0.1	0.8	0.4	0.6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 1990—2005年数据《2000—2005年：我国职业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统计研究》2008年第2期）；2006—2015年数据为CSS历年数据。2005年缺少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数据。

二、中国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职业构成的多源性

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中等收入群体初具规模。以个人年收入相对标准划分，目前就业者中低收入群体占45.8%，中等收入群体占30.1%，高收入群体占24.1%（参见下表2）。而从就业的职业结构看，各类职业群体均有不同比例的成员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或高收入群体。王建平通过对比中西方中产阶级发展路径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外源现代化，其社会转型是一种骤变式社会变迁，因而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构成及特征都表现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中国把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变迁路线集成压缩起来，于是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就表现为新、旧中产阶级职业的共生并存^[3]。张翼则将中国中产阶级发展与全球正在

进行中的后工业化、网络化相结合，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是“压缩式超越性现代化”，即中产业化、后工业化、网络化同构的社会发展^[4]。也有学者把中国现阶段自身变革因素纳入其中，以凸显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张宛丽认为，中国存在的体制分割、地区分割在急剧变迁形态下，使得新中产阶级的构成具有多元分割的突出特征^[5]。总之，论者将当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演变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以及城镇化、网络化、体制转轨等相结合，由此表明中国短期内快速变迁改变了以往中等收入群体产生、演变的循序规则，从而表现出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快速分化，使每个职业群体均获得了不同的发展机遇，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路径，表现出现阶段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职业构成的多源性。

表2 职业结构的收入群体划分 (%)

	总体	收入群体			合计
		低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	
白领	20.5	9.1	34.3	56.6	100.0
灰领	3.6	6.7	31.5	61.8	100.0
商业蓝领	11.6	17.1	38.9	44.0	100.0
服务业蓝领	8.6	22.8	44.0	33.1	100.0
工业、建筑业蓝领	19.4	17.4	48.1	34.5	100.0
农民	34.4	77.0	18.5	4.5	100.0
老年就业	2.0	35.0	40.8	24.2	100.0
合计	100.0	45.8	30.1	24.1	100.0

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营销人员和普通办事人员构成的白领阶层作为工业化、现代化的产物，而成为通常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良好的受教育水平、较高且稳定的工资收入、良好的职业声望使其成为人们向往的对象和商业营销的消费符号。而就中国目前的白领阶层构成看，除了上述优势外，“体制内”特征也成为其重要的表现。CSS调查显示，56.9%的白领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任职，34.5%的白领在私营企业任职，其余白

领则在三资企业、民办事业单位等任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完全由于市场转型或现代化进程塑造了中国现阶段的白领阶层，而是由制度保障的“体制内”精英构成了其主体。

以一线制造业、服务业拥有较高技术能力或兼具管理职能的工人构成的“灰领阶层”也以较高比例进入中等收入或高收入群体。尽管目前对“灰领阶层”的界定尚缺乏共识，但作为后工业化时期技术进步和管理提升的需要，低端白领与技术蓝领的融合已成为现实。

有学者认为,从市场定位来看,“灰领阶层”的收入水平较低,社会上偏重学历的传统观念导致“灰领阶层”的市场地位不高,而市场的供不应求将会提升“灰领阶层”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6]。就中国目前就业市场情况看,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滞后,导致高水平技术工人长期短缺,已成为结构性问题。因此,后工业化时期需求造成的“灰领阶层”稀缺,使其成为现阶段中等收入或高收入群体的一部分。

商业、服务业、工业、建筑业蓝领群体中有80%左右的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或高收入群体。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自2006年以来,中国大陆平均工资水平增幅超过1倍,2014年中国大陆地区正常月薪平均达到685美元。而据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与咨询公司德勤联合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自2005年起的10年间,中国大陆劳动力成本上升了5倍。从CSS调查数据看,2007—2014年,商业、服务业和工业建筑业蓝领群体平均年收入分别增长2.3倍、1.5倍和3.8倍,分别达到49302元、35112元和36197元。中国自2012年首次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2011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加之城市生活成本不断上升,从而加速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商业、服务业和工业建筑业蓝领群体收入的增长。

在各类群体中,农民阶层进入中等收入或高收入群体比例最低,其中77%仍处于低收入群体。仅就种植业而言,农民阶层进入中等收入或高收入群体的主要因素是通过土地流转而实现规模化经营。CSS2015年调查显示,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农民家庭实际耕种面积平均分别为12.5亩、13亩,而低收入群体农民家庭平均为7.1亩。同时,与CSS2013年调查数据相比,2015年中等收入或高收入群体的农民家庭实际经营规模均有较大提高。

将60—69岁老年就业单列并非将其作为单独阶层,而是为了突出老龄化背景下现阶段中国就业领域的新现象。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就业率经历了逐步下行的过程。从历次人口普查情况看,中国城镇老年人就业率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分别为17%、10.1%和6.7%。但近年来,中国城镇老年人口就业率呈现回升态势。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历次数据显示,2006年、2008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中国城镇60—69岁老年人口就业率分别为9.5%、10.4%、8.9%、18.8%和17.5%。在经济增速下行预期加大、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下降和子女对老人的代际经济支持能力减弱,甚至需要老人“反哺”子女的背景下,原有造成城镇老年人口就业意愿下

降的因素发生趋势性转变,导致城镇老年人口就业意愿上升,就业率提高。老龄人口再就业,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意义在于,其在巩固自身收入的群体地位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着家庭收入的群体地位。2015年,全国城镇60—69岁老年人中,无业人员退休金年收入平均为24061元,而再就业人员年总收入平均为34192元,这一老年群体的再就业平均可以获得相当于42.1%退休金的收入。

从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到,现阶段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或高收入群体的职业构成具有多源性,即每一职业进入中等或高收入群体均有其自身逻辑,包括白领的“体制性”因素,“灰领阶层”的后工业化过程中的稀缺因素,蓝领的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短缺因素,种植业农民的规模化经营因素,以及老年再就业人口的养老金补偿因素。因此,在经济结构快速变迁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或高收入群体的职业构成的多源性,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阶段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异质性。

三、中国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 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

尽管目前中国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初步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初具规模,但从就业结构看,其今后发展仍具较大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背景下,未来中等收入群体中的蓝领群体将承受较大压力。一方面,目前中国蓝领群体中,建筑业工人所占比例较高。CSS调查表明,随着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基建规模的扩大,建筑业工人在蓝领群体中的比例持续上升。2008年为14.5%,2011年为19.9%,2013年为22.4%,2015年为24.3%。而目前,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和三、四线城市住房的高库存压力,均表明未来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速将有所下降,势必会对今后建筑业的用工需求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制造业用工成本的提高促进了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拥有工业机器人最多的国家。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对工业蓝领的用工需求。据广东东莞市统计,截至2016年9月,东莞的“机器换人”专项行动已减少约8万用工。而在商用机器人方面,2016年被称为是其产业化的起跑年,2017年则将是产业化加速的一年。其在餐饮、酒店、商超等商业、服务业领域的逐步推广应用,也将替代这些领域的重复性工作岗位,这就会对今后商业、服务业蓝领的用工需求产生一定的压力。

第二,在中国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未来农民群体结构或产生较大变化,新型职业农民规模将逐步扩

大。目前,农业生产成本高效率低、农产品结构供需失衡、农业资源环境问题严峻、农业科技创新不足、农业劳动者老龄化等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中国农业的发展。为此,中央大力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农业综合效率、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除在制度层面加快土地制度、价格机制、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以提升农业生产力外,继续推进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经营并创新规模经营方式,造就培养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已成为重要举措。据农业部统计,到“十二五”期末,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规模达到1272万人,比2010年增长55%,而到2020年将超过2000万人。因此,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农民群体构成将发生较大变化,新型职业农民比例将不断提高。

第三,非公领域白领阶层规模的扩大将成为今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关键之一。针对于目前中国白领群体中“体制内”白领所占比例较大的现实状况,今后这一群体能否持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外”白领规模的提高。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的加大以及经济运行过程中“脱实向虚”倾向的存在,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1—11月份仅增长3.1%,同比回落7.1个百分点,是2012年正式开展民间投资统计以来的首次下降。为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2016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保护民营企业产权,被舆论认为是“对民营企业的重大利好”,是为民企和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但其真正落实仍有赖于政府职能转变、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的持续推进,以及对相关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解决。

第四,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具有稳定的就业岗位和开放的晋升通道,是通常意义上人们对中等收入群体就业特征的基本看法。但在现实中,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质量依然较差,表现为就业稳定性较低、非正规就业比例较高、晋升机会缺乏。调查显示,从就业稳定性看,75%的高收入群体表示自己在未来六个月内不可能失业,而中等收入群体的这一比例为61.9%,低收入群体为50.9%;而从职业结构看,白领阶层这一比例为81%,灰领阶层为67.3%,商业蓝领为66.8%,服务业蓝领为61.2%,制造业、建筑业蓝领为51.4%。可见,除高收入群体和白领外,其他群体均表现出对未来职业稳定性的较大担忧。从就业形式看,中等收入群体非正规就业比例较高,劳动权益难以保障。2015年,白领阶层中非正规就业比例为16.2%,灰领阶层为37.3%,商业

蓝领为52.2%,服务业蓝领为58.2%,制造业、建筑业蓝领为63.4%;而从中等收入群体看,其中46.3%属于非正规就业。相对于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在社会保障、劳动保障及就业质量等方面均表现出社会保障程度低、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工作时间较长等问题。从晋升机会看,晋升机会缺乏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工作满意度最低的方面。在调查中,我们从多个方面询问受访者对于目前非农工作的满意度。结果显示,以10分为满分,中等收入群体对于单位人际关系满意度均在7分以上,对工作安全性、工作环境、个人能力发挥的满意度均在6分以上,对收入待遇满意度在5分以上,而对晋升机会的满意度则在5分以下。因此,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甚至部分高收入群体而言,就业仅仅是获得收入的渠道,而非向上社会流动的渠道。

因此,对于现阶段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而言,蓝领群体用工需求规模的下降、“体制外”白领群体发展的迟缓、新型职业农民群体规模过小、中等收入群体就业质量堪忧等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未来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另一方面,当经济高速增长期,收入的提升掩盖了未来发展的脆弱性;而当经济增速下行时期,这一脆弱性便可能显现。事实上,即使在发达国家,人们在将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同时,也对这一群体在面临诸多压力时所表现出的脆弱性表示担忧。而对于中国初生的中等收入群体,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依然较大。

针对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状况,今后的着力点首先在于农村。就中国农村人口比例依然较大、农民在低收入群体中所占比例较高、农民工成为蓝领阶层主体等现状而言,首先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对中国总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在积极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同时,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以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并促进其市民化。其次,应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就业,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提高就业质量,以加强中等收入群体安全感、稳定性。再者,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推进教育公平,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在职培训和成人教育,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以适应中国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并由此形成以知识、技术为核心,以专业化职业发展为基础,具有有序社会流动机制的中等收入群体发展路径。同时,面对中国老龄化社会的严峻现实,应在提高老年人养老保障水平的同时,加快出台有关老年人再就业的法律法规,以巩固中等收入群体发展规模。

[参考文献]

[1]李培林,朱迪.努力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基于2006—

- 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1).
- [2]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3]王建平. 中国中产阶级的内在焦虑与惶惑 [J]. 当代中国研究 2007(1).
- [4]张翼. 网络中国社会阶层及治理发生重大转型[EB/OL]. 凤 (范 雷(1965—),男,浙江绍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与大数据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发展社会学研究。)
- 凰新闻 2016-12-26. http://news.ifeng.com/a/20161226/50475656_0.shtml.
- [5]张宛丽. 中国“新中产阶级”遭遇“精英联盟”“权力排斥” [EB/OL]. 人民论坛, 2007(9).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5714217.html>.
- [6]陈千雪. 基于韦伯分层理论的灰领阶层研究 [J].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08(4).

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趋势: 2006—2015

朱迪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是指工作稳定、物质生活比较宽裕、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人群。这一群体的特征在于同需求较为饱和的高收入群体相比,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弹性更大,包括一些刚性需求和更高层次的发展和享受的需求;同低收入群体相比,中等收入群体的购买力更高,消费意愿也更强烈。随着中国家庭收入的普遍增长和家庭财富的积累,消费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大众消费已成为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驱动力。

一、中等收入群体的家庭支出趋势

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拥有较高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很多实证研究认为是扩大消费的重要力量。上海研究院社会调查和数据中心课题组的分析表明,上海的中等收入群体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消费欲望,以及更为丰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频繁参与文化、娱乐和休闲消费,更愿意在子女教育、文化品味、休闲旅游和绿色消费等方面投资^[1]。张翼使用2013年(CSS)数据发现,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生存性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新中产阶层的发展性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目前产能供给与新中产阶层的消费品位存在差距^[2]。张林江、赵卫华认为,中产阶层对商品和服务的要求更个性化、品质化、差异化、精细化,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更高,更强调重视服务的良好体验性,因此在庞大中产阶层消费转型支撑下,具有良好消费体验性的“想象力经济”有着广阔发展空间^[3]。

但在目前阶段,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遭遇向上流动、生活质量、社会保障和阶层认同等多方面的困境,不利于阶层规模的扩大以及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对此,已有研究从收入、就业、供给、消费多个维度提出了发展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的政策建议^{[4][5][1]}。收入方面,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理顺收入分

配秩序,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就业方面,加快打造现代服务业就业体系,促进大学毕业生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探索更加完善、人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供给方面,促进产业升级和产品创新;消费方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物价房价,加强市场监管,改善消费环境。张翼特别提出,扩大消费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民生保障——消费刺激政策要在各阶层之间进行收益的公正性评估,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与时代发展成果^[2]。

本文使用收入中位值作为参照标准,将收入等于中位值的0.75倍及以下的人群定义为低收入群体;将收入高于中位值的0.75倍但低于中位值的1.25倍(包括1.25倍)的人群定义为中低收入群体;将收入高于中位值的1.25倍但低于中位值2倍(包括2倍)的人群定义为中高收入群体;将收入高于中位值2倍的人群定义为高收入群体。

本文所使用的2006—2015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实施,使用多阶随机抽样的方法,范围基本涉及全国25—28个省/自治区的城乡区域,调查对象为18岁以上的中国公民,共有41685个样本。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以2015年为例,中等收入群体中有62%分布在城镇地区,只有38%分布在农村地区,高收入群体中则高达82%分布在城镇地区;而低收入群体中只有32%分布在城镇地区,68%分布在农村地区。因此,从收入阶层的分布也反映了城乡发展差距的鸿沟。

从职业特征来看,中等收入群体集中在服务类职业以及生产运输工人,这一趋势在城镇地区更为明显。2015年有26%的中低收入群体和24%的中高收入群体为生产和运输工人,该人群在中等收入群体中所占比例最高,由于拥有一定的技术或工作经验,比普通工